

移 模 譯

談蘇聯文學

蘇聯作家答英國作家問

社 代 時

移 模 譯

學 文 聯 蘇 談

(蘇聯作家答英國作家問)

Б Е С Е Д Ы

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Отвѣт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на вопросы
англ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2-е изд.

談 蘇 聯 文 學

(蘇聯作家答英國作家問)

翻 譯 者 移 模

發 行 者 姜 格 芳

總 經 售 時 代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〇二七四

電報掛號 ЕРОСНРУВСО (五二〇〇〇一)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版(2000冊)

一九四九年八月再版(2500冊)

БЕСЕДЫ

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Ответ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на вопросы
англ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2-е изд.

談蘇聯文學

(蘇聯作家答英國作家問)

翻 譯 者 移 模

發 行 者 姜 格 芳

總 經 售 時 代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〇二七四

電報掛號 ЕРОСНРУВСО (五二〇〇〇一)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版(2000冊)

一九四九年八月再版(2500冊)

原书空白页

英蘇文化協會文學組曾經提議：英蘇作家就有關文學的問題，用書面問答的方式，互相交換意見。蘇聯作家把他們的問題送到英國去之後，倫敦和其他都市的作家集會上都有過廣泛的討論。在回答了這些問題之後，英國作家也向他們的蘇聯同業提出了好些問題，這些問題經過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文學組幾次討論之後，將答覆送到英國去。這裏發表的是蘇聯作家答覆的大部份。

—

J·B·普里斯特萊問：

英美作家常常把他們計劃中的作品去和他們的代理人或出版商討論。蘇聯作家是和誰討論他們計劃中的作品的？

山姆爾·馬彌夏克答：

一件計劃中的作品，在動手寫出來之前，先就它的主題和形式來加以討論，這是在蘇聯作家間很流行的。最先，這種討論是由蘇聯作家協會和協會的各小組（散文作家組，詩人組，劇作家組等等）進行的。然後，再和出版家討論；一個蘇聯作家的作品常常認定交給某一個編者，使他成為那個作家的第一個讀者、顧問和批評者，連續數年之久。如果這計劃中的作品是一個劇本或電影腳本，那末討論往往是和劇場或攝影場工作人員進行的。

然而這種寫作前的討論並不是生硬地規定的，有些作家當然不歡喜在作品完成之前就加以討論的。

瑪麗愛姐·莎吉壤答：

我們倒是常常討論寫好的原稿（在作家協會的小組會上，在作家俱樂部裏，在讀者集會上，在圖書館裏以及在其他地方），而不大討論一本書的計劃。在個人方面，我從不討論我想寫的東西；我還是相信那古老的習俗：在孩子生下以前，不談孩子。

二

J·B·普里斯特萊問：

如果一個蘇聯作家業已用完了他的版稅，而爲了某種原因，他覺得不想再寫旁的什麼，那末他怎樣呢？

瑪麗愛姐·莎吉壤答：

一個蘇聯作家在需要錢的時候可以向文學基金會借款，這個會是作家的一種互助組織，它的基金的來源是出版家和戲院方面的捐款，相當於每一本出版物的版稅的百分之十（此數並非從作者應得的版稅中扣除，故作家所得的仍是全部版稅）和每一次上演售票所得的百分之二。文學基金會在必要時候也供給作家和他們的家庭以療養費用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在需要錢的時候，一個蘇聯作家也可以得到文學

基金會的一筆贈金，日後無須歸還，他或者也可以接受一家報紙、雜誌或出版商的委託而出外旅行，把他的經驗或收集的材料寫一本書，所有的費用完全由上述機關付給。

喬奇·姆狄凡尼答：

按照蘇聯的版權法，劇作家對於全國任何地方上演的戲，都應獲得座所得的百分之幾的上演稅。電影的編劇家應得百分比的多少，視影片流通的廣狹而定。散文作家和詩人的作品每次再版都拿版稅，如果他們有計劃中的新作品，便可以向出版家預支。

此外，他們還可以獲得文學基金會的援助。

尼古拉·鐵靈諾夫答：

如果一個作家不預支一本新書的版稅（假使他尚未開始寫作的話），他還有其他許多機會可以維持生活。他可以給任何報紙寫任何題目的文章和寫小說，給各雜誌寫新聞簡報和批評小品。他也可以在電台上朗誦他已發表的作品。再不，他可以在工人俱樂部等等的集會上朗誦或背誦他的作品；或者他可以獲得文藝朗誦局的協議，旅行蘇聯各城市，朗誦或演講他自己的詩歌或小說。而且，他也可以把蘇聯各民族文學

的譯文加以編輯。他又可以向各製片廠自薦，給他們編電影脚本，寫新聞片的說明或有聲電影的對白。他可以寫小冊子，討論各種大眾關心的問題。

如果因為健康不良，這一切機會都對他無緣的話，那末他可以獲得作家協會或文學基金會的援助，到療養地或療養院去調養休息，或者他可以也獲得一筆贈金。

三

傑克·林德賽問：

自馬雅可夫斯基以來，關於把詩歌和口語聯繫起來的事，已發現了什麼道路？

瑪麗愛妲·莎吉娘答：

這是一個極端有趣的問題。在我看來，戰時為我們軍隊寫作的詩人在這方面已有若干的進步。這種把詩歌聯繫於口語的過程，在東部諸蘇維埃共和國內各民族的文學中尤為顯著，如在亞塞拜然，土耳其曼和哈薩赫斯坦。這些民族的詩歌的用語，以前多是藻飾的東方式的隱喻，大部份起源於阿剌伯或波斯，但是現代的口語文字已開始佔優勢了。

山姆爾·馬爾夏克 答：

在把詩歌聯繫於口語這一工作上，馬雅可夫斯基的確盡了許多力，但是他並非向這方面努力的唯一的詩人。今日蘇聯的詩歌裏包含着許多新的聲調，那是來自人民的。我們的文學，在文字方面，因為從地方方言裏採用了許多比喻和口語，而格外豐富了。馬里區，烏拉爾區，西比利亞，斯摩倫斯克區，以及我們廣大國土的其他區域的方言，都在我們詩歌的用語上留下了痕跡。

尼古拉·鐵霍諾夫 答：

蘇聯的詩歌，尤其是俄羅斯的詩歌，從各種角度看，都是有各種特點的，而聲韻格律也是向着許多不同的方向發展的。近年來，尤其在戰時，它顯然傾向於樸素化，這增加了詩歌的明曉性，同時當然促進了它和口語的聯繫，使得接近於自然的聲調；在戰時許多新語詞加進了詩人的語彙，使這種傾向更加深化。過去幾年的經驗是無法用無個性的隱喻來描寫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格律複雜的詩歌已經消逝，所有的詩人全用同一的風格寫作了。每個人還是保有着他自己的風格的特點。馬雅可夫斯基的風格也因誇喻和其他自己的的詩歌的比喻而複雜化了，他的風格自

然沒有人盲目地摹倣，但是在他同時代的詩人和新一代的青年詩人的作品裏，他的詩歌的某種因素的影響是看得出來的。

巴維爾·安托柯爾斯基答：

馬雅可夫斯基在詩歌的領域裏是一個革新者，在找尋新的表現方法時，他是革命的和大胆的，這和前一代詩人的一般公認的成就是一個對照。這是對象徵主義的一種解放，那些象徵主義者太關心於神的美酒和美食，因天上的主題而忽略了人間的主題。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是一個直接的急變——復歸於人間，歸於現實主義，歸於鮮明的可以捉摸的視色和音色。

這不單可以應用於作為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的許多目標之一的「通俗」文字。他的風土的平凡主義是他那革命的抒情詩的一般民主熱情的因素之一，但是同時却常常伴同着複雜的隱喻，一種十分精巧的安排和最高提的修辭——這一切都是距離「通俗主義」很遠的。因此，我們覺得馬雅可夫斯基的遺產和他留下的傳統，比之傑克·林德賽先生的問題所提供的，是更廣大和更深入的。

在一切蘇聯詩人的作品裏，也許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可以感覺到馬雅可夫斯基的影響，不過形式不

同而程度也各異吧了。阿賽耶夫和基爾薩諾夫是他的影響的最有力、最有恆心的宣傳者。這兩位詩人有好些年跟着馬雅可夫斯基零覓韻律，效法他的技巧。賽爾文斯基的史詩和戲劇，他的色彩豐富的藝術，他的雕刻人物和給予其人物以一種特有的語言的這種才能，也有許多是得之於馬雅可夫斯基。鐵霍諾夫獻給西方國家的詩，也有馬雅可夫斯基的許多痕跡和他特有的一種熱情。列別傑夫·庫馬奇的諷刺文也自同樣的來源吸收它的靈感。

這些是隨便舉的幾個例子。當然並沒有把問題完全答覆。

四

羅斯·麥考萊問：

歷史和傳記的研究進行得怎樣？保存記錄的機關和其他供人研究的圖書館等良好麼？學者利用這些機關和圖書館有什麼方便？最近出版了些什麼歷史研究的作品？

瑪麗愛妲·莎吉孃答：

在蘇聯作家協會和蘇聯全國每一個較大的國家圖書館裏，都有保存記錄的組織。我們的國家圖書館有

着很好的圖書基金和檔案處。列寧格勒公共圖書館在它的珍貴的物品中，有着伏爾泰的手寫稿和圖書，上面有許多極有趣的註腳。學者可以整天在圖書館裏工作。（圖書館從一早開放到晚上十一時，每一個圖書館每月祇停止開放一天）。學者在圖書館裏工作，可以在任何題目方面獲得顧問的指導和幫助，這種指導和幫助，和圖書一樣，是免費的。學者借書出外，祇要寫張收據，也是免費的。

我現在剛收到印刷所送來的我寫的關於偉大烏克蘭詩人達拉斯·謝夫成果的一篇專論。作為一個哲學博士，我不斷地從事於文學史的研究，除了旁的寫作之外。目前，我正在專心研究十一世紀亞塞拜然詩人尼薩密，我正在把他的詩《Maksaw al Asrar》譯成俄文。巧得很，赫登·辛納立對這詩有一種英譯，並且為巴庫的尼薩密研究院取得一份抄本。這會是可能的麼？

華西里·楊答：

蘇聯已出版了許多傳記和文學的研究，例如學術院出版的：「英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希臘文學史」，「俄國文學史」；其他如葉爾米洛夫教授的「柴霍夫」，A·葉戈林的「十九世紀俄羅斯文

學的解放思想和愛國思想」；傳記方面有各出版家發行的葛里波葉陀夫，契爾納雪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傳記。

伊哥爾·薩茨答：

這個問題正和我所工作的領域有關，因此，我覺得三言兩語很難回答。在蘇聯，文學史家和讀者都十二分地愛好作家和一般文人的傳記。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比之革命以前，現在要廣泛和深刻得多了。蘇聯政府一成立，千萬種原稿，信件，公文，肖像，圖本等等，兩世紀來一向被藏在私人檔案處的（如皇家辦事處，警憲機關，宗教議會等），立刻都公開給研究工作任意處置了。許多材料是私人捐獻給國家圖書館和博物院的。

由於整個文化網的密切融洽，使得這些一度祕藏的珍物，在登記，分配，科學分析和敘述方面，能够通盤籌劃，獲得一個統一的制度，使它們成為國富的一部份。『蘇維埃學派』的書目提要學，訓詁學，考證學，以及科學的歷史批評是成長了。對於我們科學家的工作，我們頗為自豪，這態度我們並不認為太放恣。他們的工作不但對著名傳記中的疑點有所闡述，而且結果往往有新的發現，完全改變了以前的觀念。

由於研究的種種方便和政府供給科學家的生活保障，使拉其歇卡，克雷洛夫，葛里波葉陀夫，普希金，萊蒙托夫，赫爾岑，聶克拉索夫，謝夫成果，契爾納雪夫斯基，伊凡·屠格涅夫，列夫·託爾斯泰，薩爾蒂可夫-錫且特林，柴霍夫，馬克西姆·高爾基（阿列克賽·畢希柯夫）……等人的真實的史跡，都能獲得。關於俄羅斯文學和外國文學的關係，我們已經發掘了許多新的資料。各國研究巴爾扎克，梅禮美，米克微支和其他許多外國作家的人，如果下來參考蘇聯的材料，就無法爲這些文人編著真正科學的傳記作品。蘇聯出版家首創刊行的許多傳記是一切傳記作家的寶庫。

即使最簡短地說一說蘇聯傳記研究的概況，也不是我們這兒所有的篇幅所容許的，尤其如果我們要評論到那末嚴格地科學化的，同時卻又流利可誦的作品，如尼古拉·鮑高斯洛夫斯基的『論契爾納雪夫斯基』（一九四三年出版）和葉夫格尼·蘭恩的『論狄更斯』（一九四六年出版）。

在所有的博物院裏，和在圖書館裏一樣，都有記錄保存處工作着。在有些專門性的博物院裏（如文學博物院，莫斯科和雅斯納亞·波梁亞那的託爾斯泰博物館，列寧格勒的普希金紀念館，大岡洛格的柴霍夫

博物館，薩拉托夫的契爾納雪夫斯基博物館等等），傳記書目提要的工作在不斷進行，索引和書目在經常出版，研究工作者如果有任何疑問，上述的機關都可以提供答案。莫斯科列寧圖書館和列寧格勒薩爾蒂珂夫圖書館的書目處和檔案處，都從讀者那裏得到了他們應得的歡迎。那兒除了對任何問題提供答案外，還讓讀者訂購圖書和原稿的節錄。這些機關都經常交換情報，時常把它們的印刷物的一部，給予它們的姊妹機關使用。

每一個蘇聯公民可以接觸到蘇聯的一切書籍和科學藏書。自然囉，有些珍本和原稿藏在專門的博物館裏，那兒的閱讀地位有限，最先祇能讓最需要的人使用。學生如果有教授或學校當局的介紹，也可以享受這個優先權。各大學各自的藏書，也很豐富。

在蘇聯，尤其在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間，傳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曾成為熱烈討論的題目。那時候，文學史上存在着一種庸俗的社會學的傾向，可以弗理采教授和貝列維爾賽夫教授為代表，他們極端概念地處理着傳記的資料；他們祇用一般的法則和有關某個作家所屬階級的歷史事實來機械地解釋他的創作天才。這種歷史家時常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事實上他們更接近泰納或較後的霍遜司坦因那一類的資產階